

扶乩與占卜的旅程： 葉名琛的預言技術與政治境遇*

鄭西迅

摘要

兩廣總督葉名琛(1807–1859)在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時期，因迷信神意導致廣州城陷的說法廣為流傳，學界以往對此有所討論，但並不深入，相關史料存在很大的解讀空間。「葉名琛檔案」存有占卜、扶乩記錄七件，逐一解析，可知這些記錄形成於咸豐元年(1851)至咸豐七年(1857)，多以預測政局、指導決策為目的，或由葉名琛直接產生，或與他本人關係密切。這些材料成為理解葉名琛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表現的基礎。通過重建「吳煦檔案」中一件匿名未上奏折的生成語境，結合戰爭親歷者額爾金(1811–1863)、華廷傑(1822–1872)、陳澧(1810–1882)等人的記述，可以確定葉名琛在廣州戰時多次祈神，這與守城失利有關。從這些記錄看，葉家應該是一個熱衷扶乩的奉道世家。葉名琛的經歷呈現出預言技術與現實政治之間的互動，提示以社會史視角觀察政治史的展開之外，還有助於理解在一般歷史中被忽視的精神世界。

關鍵詞：葉名琛、占卜、扶乩、第二次鴉片戰爭、精神世界

鄭西迅，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史，側重晚清的政治與社會。

* 本文寫作得到業師戴海斌教授指導。初稿承張玉清老師、鄒子澄同學提供極詳細的批評意見，後得到裘陳江、任智勇老師以及牛澎濤、何需同學的指點。在相關論題上，趙文坦、王見川、范純武、徐進、張曉川、孫齊、王藝朝老師及易多明、羅熠、董洪杉同學都提供過幫助；蒙心老師指導了六壬占卜的解讀。謹此一併致謝！還要特別感謝兩位匿名評審銳利而寬容的意見，以及黃綺婷老師的耐心編校。一切文責由作者自負。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晚清外交文書研究」(23 & ZD247)階段性成果。

一、引言

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戰爭進程的關鍵一環，在咸豐七年(1857)十一月廣州之戰，中方敗績，廣州城破，兩廣總督葉名琛(1807–1859)被俘。戰敗的原因自然很多，其中最讓人好奇的說法，是葉名琛迷信神意指示，認為英法聯軍會自行退去，故而不事守備，因此失城。這一解釋長期流傳，為人熟知。¹

不同於許多層累而成的敘事，戰爭親歷者在當時就注意到這種說法，對此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葉名琛被英人俘虜上船後，船上有人在一同繳獲的兩廣總督衙門檔案(即「葉名琛檔案」)中發現一些占卜文書(horoscopes)，同行的英國《泰晤士報》記者柯克(George Wingrove Cooke)與葉名琛交談，據此詢問他是否占卜過政治事件。葉名琛回答說沒有，並稱：「我總是忙於公務，哪有時間做這些事？」²柯克似有懷疑，持續發問，葉名琛相當生氣，重複說：「我的時間都用在公務上了，怎麼可能有時間去占卜呢？」的確，在各種場合，算命先生(fortune-tellers)到我那去過：這種事是有的，但他們從未影響過我的公事。」柯克仍不死心，最後問：「這些占卜文書的發現，讓一些人認為它們影響了您，使您忽視了廣州的防務？」葉名琛回答說：「在公事中我從不考慮這些事情。」³問答至此結束。

很明顯，柯克的提問有強烈預設，他認為葉名琛通過這些手段預測過政治事件，只是想聽其親口承認，這一預設估計就源自當時的諸

¹ 記此事的著作如[清]薛福成：〈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庸庵文續編》，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3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影印光緒丁亥孟春刻本)，頁151上。此篇寫作時間在丁亥(光緒十三年，1887)。光緒十四年，廣東籍京官張蔭桓與同鄉夜飲時談到葉名琛，同樣說起此事。參任青、馬忠文整理：〈光緒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張蔭桓日記》，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359。後來的研究著作大多注意到這些說法，但均未深入討論，如魏建猷：《第二次鴉片戰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頁59；茅海建：〈入城與修約：論葉名琛的外交〉，《歷史研究》，第6期(1998)，頁88；夏笠：《第二次鴉片戰爭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頁281。

² George Wingrove Cooke, *China: 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58* (London: G. Routledge & Co., 1858), 408–409.

³ Ibid., 409.

種傳聞。而葉名琛的答語充滿矛盾。一方面，他堅持占卜、算命之徒無法影響公事；另一方面又承認算命之徒多次到他那去過。

這一段曖昧的問答指向多元，能夠生發出許多解讀思路，但若單純從此入手立論，仍顯單薄。⁴在此，柯克所見葉名琛檔案中的那批占卜文書，更有助於將討論引向深入。黃宇和詳細查閱過這批檔案，⁵列出「有關扶乩占卜的文獻」六條，⁶註明時間並概括大意。他認為這些記錄裡，「第一、三條是江西寄來的。第四、五條是有關廣西的。第六是占天下大勢的。唯一關於廣東的只是第二條」，即「在內政上，葉名琛駕馭兩廣十餘年的驚濤駭浪中，只有一條占卜」。⁷這一論證也許有些輕率。其一，該檔案並非完整的兩廣總督衙門檔案，只是葉名琛從戰火中搶救出的殘卷，體量不大，從常理推測，更多的占卜文書已化為灰燼。其二，這些記錄裡蘊含的歷史信息極為豐富，需要細緻解讀，據「江西寄來」等零碎片段遽然得出結論，不足以令人信服。

大致上說，葉名琛迷信神意與廣州失守之間的關聯性仍未被深入討論，與這一議題相關的絕大多數史料至今仍存在很大的解讀空間。而且，無論是就此譏諷葉名琛，還是為其辯護，其實都遵循著同一種思維模式，即認為扶乩、占卜等行為十分荒謬，這可能妨礙進一步理解時人的精神世界。

⁴ 蔣孟引（又名百幻）很早注意到這段對話，並在博士論文中予以引述，他大致同意葉名琛的說法，認為占卜無法影響其公事，且與守城失利無關。Pei-Huan Chiang 蔣百幻，「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856–1860」（Ph.D. dis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39），229–230。蔣孟引的博士論文原稿與後來出版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區別極大，博士論文中對葉名琛的正面描寫後來基本被刪除殆盡。對此最深入的研究是鄒子澄：〈武力外交與侵略戰爭——蔣孟引與二十世紀第二次鴉片戰爭史研究的兩次變革〉，《新史學》，第36卷第1期（2025），頁159–230。

⁵ 這批檔案內容豐富，黃宇和對其整體進行過充分研究。黃宇和：《兩廣總督葉名琛》（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此外有學者討論過部分內容，如劉志偉：〈鴉片戰爭前廣州貿易體系中的寧波商人——由「葉名琛檔案」中有關寧波商人的幾份檔案談起〉，《海洋史研究》，第2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109–121；張應強：〈「葉名琛檔案」解讀一例：從「拜會」看19世紀50年代的廣東地方社會〉，《廣州文博》，第9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頁126–135。

⁶ 扶乩是通過特定儀式，使神明在乩生身上附體，寫出字跡以傳達神意的活動。

⁷ 黃宇和：《兩廣總督葉名琛》，頁12。此版與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差異較大，尤其是關於葉名琛扶乩、占卜的論證，幾乎重寫，但觀點一如既往。本文的引述均以新版為準。此書底本是黃宇和1971年在牛津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

即便是靜態的史料文本，其本身都蘊含著動態的歷史過程。本文擬將文本置於其生成語境中觀察，從逐一解析檔案中的扶乩、占卜記錄入手，理清相關時段（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葉名琛的預言技術與具體政治情勢間的互動關係，最後嘗試在19世紀中葉的歷史語境中解讀葉名琛的行為。

二、「葉名琛檔案」中的扶乩、占卜記錄解析

咸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1857年12月28日）黎明，集結完畢的英、法聯軍發動總攻，持續炮轟廣州城，尤其是廣州新城內的兩廣總督官署。據南海縣知縣華廷傑目擊，危殆之際，葉名琛「獨在此尋檢緊要文件」，官紳反覆敦勸，其始攜帶檢出文件遷入廣州內城，不久而「全署火發，盡化灰燼，行李重物無得出者」。⁸城破後，經過一番搜尋，聯軍在二十一日俘獲葉名琛及其所攜文件，這就是現存葉名琛檔案的由來。⁹由於扶乩、占卜事涉隱幽，少有相關記載，因此難以確定葉名琛的這一習慣何時養成。從檔案來看，他很早便以占卜預測過具體的政治情勢。以下按時序逐件解析文書內容，為避免內外問題雜糅，此處只結合外部語境進行分析。文書的完整錄文及必要的占卜原理闡釋，請參文末附錄。

（a）FO931/1596¹⁰

此件為六壬式占記錄，時間在「壬戌日寅時亥將」，「占獲首要各犯何日得手」。文書主要由排盤圖與解語兩部分構成。占卜結束不久，卜者根據實際情況陸續添加「初九已應，獲鄧三爵、林三槐」等旁註。在

⁸ [清]華廷傑：〈觸藩始末〉，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第1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頁180。

⁹ 黃宇和：〈全球一體化旋風中的近代中國：從葉名琛檔案談起〉，收入劉志偉、陳玉環主編：《葉名琛檔案：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殘牘》，第1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頁1-3。

¹⁰ 《葉名琛檔案》，第7冊，頁359。

六壬式占中，太陽軌跡按節氣不同分為十二位，各有定名，稱「十二月將」，其中雨水至春分對應地支為亥，故此處占辭時間記「亥將」。¹¹

文書所記捕獲鄧、林等各要犯，為廣東佛岡、英德一帶嘯聚之匪目，「結有死黨二千餘人，明分暗合」。其中，胡黃毛五為「起意復聚、屢抗官兵之總頭目」，羅恩淦為「偽軍師」，劉天成為「偽先鋒」，鄧三爵、林三槐等十人為「次頭目」。¹²這些叛亂者在咸豐元年（1851）三月被兩廣總督徐廣縉（1797–1869）、廣東巡撫葉名琛肅清。具體占卜時間則在咸豐元年二月初五日（壬戌）凌晨3至5時（寅）。

因這些頭目事關重要，占卜者一次次記下捕獲節點，觀察是否與卦象匹配，發現「逢丙日必得手」，並預言「三月十九必全局了事」。據三月二十六日徐、葉報捷奏摺，勦匪「前後七獲勝仗」，「共計殲獲六千有奇，首要各犯不致一名漏網」。葉名琛在陣前親自指揮，¹³與文書中「可以凱旋」語相符，故占卜必定出自葉名琛之意。¹⁴與柯克談話時，葉名琛否認占卜過政治事件，顯然是說了謊。

整場戰事於三月二十五日徹底結束，稍晚於預測的十九日。就葉名琛的政治生涯而言，這場勝利意義非凡，當年十一月，咸豐帝「以勦辦廣東英德等處賊匪，地方肅清，加巡撫葉名琛太子少保」。¹⁵「太子少保」為加銜，品級正二品，與卜辭「必得高官顯爵、位極一品之

¹¹ 劉科樂：《六壬時空》（北京：華齡出版社，2016），頁44。晚清的六壬占式排盤法與今日幾無區別，故可按相同原理解釋。

¹² 〈徐廣縉等奏報英德一帶剿捕告竣地方一律肅清摺〉，咸豐元年三月二十六日，俞炳坤主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第1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頁346–347。奏摺中，劉天成記作「劉忝城」。

¹³ 奏摺內有「臣葉名琛即行回省」之語，〈徐廣縉等奏報英德一帶剿捕告竣地方一律肅清摺〉，咸豐元年三月二十六日，《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第1冊，頁347。

¹⁴ 六壬式占等占卜手段多與易學有關，葉名琛深諳此道。道光三十年（1850），廣州南海神廟重修，葉名琛撰〈重修南海神廟碑記〉，其中大談卦象，有「夫海之象協坎，而南之位值離。坎為水，為隱伏，為盜；離為火，為甲冑，為戈兵。聖人設卦觀象，而守險出征，預垂訓誡，為後世慮至深遠矣」等語。洗劍民、陳鴻鈞編：《廣州碑刻集》（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頁382。

¹⁵ 《清文宗實錄》，卷四八，咸豐元年十一月己卯（二十八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40冊，頁655下；黃宇和：《兩廣總督葉名琛》，頁77。

兆」的預言接近。不久，咸豐二年（1852）七月，徐廣縉由廣西帶兵馳調湖南，葉名琛署理粵督，年底實任，¹⁶仕途達到頂峰。

在全部扶乩、占卜記錄中，這件文書時間最早，形成於葉名琛撫粵期間，在他的私人檔案中靜靜存放七年。危殆之際，葉名琛特意將其檢出帶走。

(b) FO931/1506¹⁷

此件為馬永熾致「立凡四兄」函，發出時間在咸豐三年（1853）六月初八日，函中詳述南昌被圍時期援兵調動與交戰情況。太平軍自金田起義之後迅猛壯大，咸豐三年五月十八日行抵南昌，即行攻城。¹⁸其時南昌城內統帥為湘軍將領、按察使江忠源，即函內所稱「江廉憲」；「林桂楣」即南昌候補知府林福祥，參與守城。¹⁹馬永熾為江西臨川縣令，²⁰承擔軍務，亦在城中。當時，太平軍以穴地戰術攻城，開挖地道轟炸城門，江忠源則在城門內添築月城以備，²¹即是函中所言：「江憲早防地道，先備月城，防其轟陷，此亦料敵之先著也。」援軍到後，守城兵勇士氣大漲，交戰多次獲勝。

在守城艱難的五月，馬永熾兩次扶乩，詳細記載降神情形與問答記錄。第一次降臨的乩仙為土地、道教天師許遜。二位仙人出場時誦念乩詩，面對省城安危的詢問，稱略施小術即可使太平軍火炮反打，答畢遁去。再問，只有土地降臨，稱許真君已去守城。再問地道是否可保無虞，真君返身回應，說不能保證。土地緊接著也表示前往守城。

¹⁶ 《清文宗實錄》，卷六七，咸豐二年七月壬申（二十四日），《清實錄》，第40冊，頁876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2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頁453。

¹⁷ 《葉名琛檔案》，第7冊，頁126-127。

¹⁸ 崔之清主編：《太平天國戰爭全史》，第2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916-917。

¹⁹ 同上註，頁920。

²⁰ 〈署理江西巡撫布政使陸元煥奏〉，咸豐五年十月十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奏摺，檔號：故宮125685。

²¹ 崔之清主編：《太平天國戰爭全史》，第2卷，頁923。

第二次扶乩在五月二十五日。降臨乩仙為文天祥，誦詩四句，一一解答江西省城安危、是否可守、甲乙字含義、太平軍動向乃至北京安危等問題。兩次乩語皆表示南昌戰局無礙。當年八月，太平軍因久攻南昌不克，如乩語所言撤圍「北竄」。²²

馬永熾祈「立凡」轉告請神判語，根據信件最後的下落，可以推測，葉名琛就是他希望聯絡的對象。兩處小註似為不同收信者先後添加，可知此信六月初八日發自南昌，一路南下，先經臨川縣，十三日到吉安府永豐縣，再經吉水縣，七月初四日到廣州。

馬永熾是安徽滁州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因英夷滋事，「隨赴廣東軍營出力」。在粵期間，他仕途得意，先後因軍務，「團練壯勇」、「修築炮臺、訓練藤牌兵勇」等事議敘，奉旨「以知縣遇缺即選」，並「加知州銜」，最後選授江西瑞昌縣知縣，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月到任。²³葉名琛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九月授廣東布政使，²⁴二人經歷存在重合，馬永熾也許在廣州結識葉名琛。他特意託人轉告乩語，可能意在給葉名琛提供參照。葉名琛保留此函，至少說明其並不反感扶乩。

(c) FO931/1580²⁵

此件為六壬式占記錄，占卜時間在「乙卯歲酉月巳將庚戌日巳時」，「丁卯命晝占潯州府城可保否，兵勇得力否」。

咸豐二年（1852），太平軍出廣西北上湖南。²⁶因兵事日棘，清廷難以顧及邊遠，桂省內仍是「伏莽時起，旋滅旋萌」。²⁷作為太平天國運動發源地，潯州各種「流賊」起事持續不斷。²⁸到咸豐五年（1855）六

²² 崔之清主編：《太平天國戰爭全史》，第2卷，頁926-929。

²³ 〈署理江西巡撫布政使陸元烺奏〉，咸豐五年十月十日。

²⁴ 《清宣宗實錄》，卷四三四，道光二十六年九月丁未（二十五日），《清實錄》，第39冊，頁435上。

²⁵ 《葉名琛檔案》，第7冊，頁297。

²⁶ 崔之清主編：《太平天國戰爭全史》，第1卷，頁420-500。

²⁷ 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列傳·勞崇光〉，《清史稿》，卷三九三（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11756。

²⁸ 黃占梅修、程大璋纂：民國《桂平縣誌·紀事下編》，收入《中國方誌叢書》，第131號第33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影印民國九年鉛印本），頁1277-1370。

月，據廣西巡撫勞崇光（1802–1867）奏，地方匪黨「由平南竄至潯州登岸，攻撲東西兩門，且潯梧一帶土匪最多，難保不乘機蠢動」，潯州府城危在旦夕。清廷憂慮省內兵船不敷，故「著葉名琛酌量情形，再行添撥兵丁船隻，前往潯州協勦，務將此股匪徒悉數掃除」。²⁹因此，相應的占卜時間即咸豐五年（乙卯）八月（酉）二十日（庚戌）上午9至11時（巳時）。「巳將」指對應節氣在處暑至秋分。

「丁卯命」代表占卜者生年干支，丁卯即嘉慶十二年（1807），這與葉名琛生年一致，可斷定是其本人行占。³⁰

清廷諭令葉名琛出兵援潯，對此，他需要斟酌添撥兵丁的數量。在前一年，地方民眾起義已造成整個廣東的震盪。廣州、惠州、韶州、南雄、肇慶、嘉應等府州皆有城池失守，儘管大多同年即收復，³¹但兵力已相當支絀。一方面須按旨意添兵，另一方面不能不顧及省內，因此葉名琛之前雖已兩次「派撥舟師」，³²但相較於潯州危情，仍有不敷。八月是潯州攻防拉鋸最激烈之時，葉名琛以占卜預測守城情形，所得卦象為「伏吟課」。此課為憂悶之象，表示守城難以得力，但會有名中帶金之將弁出面挽救危局。在占卜圖旁，便標記有與金有關的將弁姓字「劉、錢、金、鈕」。「雖有不全，而復之尚速」一語，則暗示城池有失而復得之可能。

占卜在二十日進行，卜辭卻稱「所憂在十八、十九」，可見兩地信息傳遞至少存在兩天時間差。其實，在八月十七日，潯州府城已經淪陷，知府劉體舒、知縣李慶福、前知縣舒樺、府經歷宣元煥、典史沈廉等皆死。³³上述卜辭與實際情形非常接近。

²⁹ 《清文宗實錄》，卷一六九，咸豐五年六月壬寅（十一日），《清實錄》，第42冊，頁873上。

³⁰ 葉名琛的生年，不少學者都標註為1809年，後有學者根據《葉氏宗譜》，訂正為嘉慶十二年（1807）冬月。陳孝金：〈清兩廣總督葉名琛家世與生平簡介〉，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溧水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組編：《溧水古今》，第4輯（無出版地，1984），頁63、69。

³¹ 黃宇和：《兩廣總督葉名琛》，頁128–129。

³² 《清文宗實錄》，卷一七八，咸豐五年九月甲申（二十四日），《清實錄》，第42冊，頁993下。

³³ 黃占梅修、程大璋纂：民國《桂平縣誌·紀事下編》，頁1371。

(d) FO931/1579³⁴

該件六壬式占記錄承前，為「乙卯歲酉月巳將庚戌日未時」，「丁卯命畫占援救潯州府城利於何日進兵」。相應時間在咸豐五年八月二十日下午1至3時（未時）。葉名琛在數小時內連續卜問兩次，極有可能是期間得到關於潯州戰況的新情報。前次占卜還寄望於潯州守城官兵，這次則確定出兵救援，只是猶豫具體日期。占卜卦象為「不脩課」，是有缺之象，暗示潯州府城城守有失，刻下即須出兵。據葉名琛奏摺，賊匪竄踞府城之後，於九月初六及十月十四等日糾撲平南地方，屢被官軍鄉練擊敗，「復由廣東省添調兵勇前往會剿」。³⁵可惜的是，不詳其出兵助剿，是否如卜辭所言在「二十四日」以前。

(e) FO931/1619³⁶

該件為葉名琛下屬呈文。其中半頁墨跡已淡，難以辨識。該函前半記奇門遁甲式占記錄，時在「丙辰年正月廿一己卯日癸酉時」，「占天下大勢何時清淨」，「以皇上為主」行占，所得結果為「宮中有喜慶，四海享太平」；後半結合當時用兵情形，分析占卜結果，末尾稱「求中堂鈞誨」。占卜的相應時間為咸豐六年（丙辰，1856）正月二十一日（己卯）傍晚5至7時（癸酉）。葉名琛在咸豐五年九月奉旨以兩廣總督協辦大學士，³⁷故稱「中堂」，其本人為收信者無疑。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與第二件相似，本件也是下屬與葉名琛分享扶乩、占卜結果，其中的討好意圖十分明顯。

³⁴ 《葉名琛檔案》，第7冊，頁296。

³⁵ 〈葉名琛奏〉，咸豐六年正月中，「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月折檔，檔號：故樞003088。

³⁶ 《葉名琛檔案》，第7冊，頁401。

³⁷ 〈咸豐五年九月初十日〉，《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5冊，頁326。

(f) FO931/1626³⁸

此件為咸豐六年八月某日署潮州運同顧炳章呈文，黃宇和誤定為咸豐元年。³⁹顧炳章是葉名琛親信，至遲在道光二十七年便與葉名琛有直接往來。⁴⁰咸豐二年正月，更被葉名琛題請以候補通判補授廣州府通判。⁴¹咸豐六年八、九月間，他持續為葉名琛打探地方情報，多次呈文詳論「潮州鹽務及地方事宜」，⁴²並「查探江西軍務」。⁴³

呈文內將咸豐元年江西硤江縣曾教職的六壬式占記錄按《大六壬全書》所示詳細剖明，並一一分析卦象及意蘊。據「謹將」、「繕具清單，恭呈憲鑒」等語，可知這一舉動由葉名琛授意。此時廣東省內的大規模動亂基本平定，但廣西的起義軍隊仍虎視眈眈。⁴⁴葉名琛此時檢出這一當年預測與敵人交戰可能情形的過往記錄，令下屬詳解，可能是揣摩其技法，為眼前局勢提供參照。

(g) FO931/0374⁴⁵

該件為乩語，黃宇和遺漏未見。此次請乩在「丁巳七月十一日午刻」，相應時間即咸豐七年（1857）七月十一日正午，此時中、英早已處於交戰狀態。

乩語起首稱，「柳真君曰，元師弟叩師呼？兩師尚未回壇也」。⁴⁶「元師弟」為扶乩者，其所請「兩師」因故未回乩壇，由柳真君出面告知。乩壇神祇皆有位次，主神「來去自如、四處降筆」，而守壇神一般「常年駐守本壇，不輕易離去」。⁴⁷柳真君應是呂祖首座弟子，多名為

³⁸ 《葉名琛檔案》，第7冊，頁427-432。

³⁹ 黃宇和：《兩廣總督葉名琛》，頁12。此條黃宇和標為FO931/81，在出版的《葉名琛檔案》中，當為FO931/1626。

⁴⁰ FO931/0142，《葉名琛檔案》，第2冊，頁187-188。

⁴¹ 〈題請以候補通判顧炳章補授廣州府通判事〉，咸豐二年正月二十六日，題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02-01-03-11020-009。

⁴² FO931/1627，《葉名琛檔案》，第7冊，頁433。

⁴³ FO931/0361，《葉名琛檔案》，第3冊，頁89-91。

⁴⁴ 黃宇和：《兩廣總督葉名琛》，頁34、127。

⁴⁵ 《葉名琛檔案》，第3冊，頁130-131。

⁴⁶ 「元」通「玄」，避康熙帝諱改。

⁴⁷ 張玉清：〈近代江南鄉紳的扶乩結社與地方社會：以川沙道善壇為中心的考察（1895-1945）〉，《民俗曲藝》，第221期（2023），頁98。

「柳榮」，一般被稱為「宏教真君」，⁴⁸相較於「二師」，位次較低。乩語中，柳真君吩咐恭叩呂祖、地官的表文在十二、十四日焚化；並詢問扶乩者起居如何，勸說戒斷鴉片；最後告知八月十五日有數子加冠，須備美酒以敬兩師。

葉名琛被俘後，柯克觀察過他的船上起居。柯克說：「葉名琛在私生活方面是一個非常值得尊敬的中國人。他完全沒有他的同胞們那些令人憎惡的嗜好，就連賢德的耆英也因這些嗜好而臭名昭著。他不吸鴉片，平時只喝溫茶，只是把白酒作為藥物。」⁴⁹葉名琛當時確實不抽鴉片，只是請求每天給他足量的中國煙（Chinese tobacco）。⁵⁰

考慮到這次扶乩距離葉名琛被俘只有四個月，如果葉名琛抽鴉片，恐怕難以驟戒。因此，此處的主持者似為其喜好扶乩的父親葉志詵（1779–1863）。葉志詵為湖北漢陽人，⁵¹道光二十八年（1848），「就養來粵」，⁵²葉名琛為其建造長春仙館、小蓬仙館，仙館是葉志詵專用的扶乩場所，⁵³但他也常在官署之中與子同住。⁵⁴一般來說，扶乩至少需要兩人進行，根據這一儀式習慣以及乩語最後的下落，可以推測，扶乩時葉名琛應該在場。⁵⁵

⁴⁸ 黎志添：〈《呂祖全書正宗》——清代北京覺源壇的歷史及其呂祖天仙派信仰〉，《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6期（2015），頁127–129。關於呂祖扶乩道壇，參黎志添：〈清代四種《呂祖全書》與呂祖扶乩道壇的關係〉，《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2期（2013），頁183–230。

⁴⁹ Cooke, *China: 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58*, 401.

⁵⁰ Ibid. 晚清官員多有吸鴉片者，如赫德（Robert Hart）記：「蔡按察使差人來通知我，叫我不要把他吸鴉片的事告訴任何清朝滿族官員。」傅曾仁、劉壯翀、潘昌運、王聯祖譯：〈1858年5月18日〉，《步入中國清廷仕途——赫德日記（1854–1863）》（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3），頁238。

⁵¹ 關於葉氏家族，可參程露：〈醫、商、儒：清代漢陽葉氏家族的世業與轉型〉，《近代史學刊》，第26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頁167–182。

⁵² 〈摹刻米芾九曜石詩跋〉，洗劍民、陳鴻鈞編：《廣州碑刻集》，頁1038–1039。

⁵³ 陳曉平：〈晚清名人與小蓬仙館〉，《同舟共進》，第1期（2021），頁59–60。

⁵⁴ 咸豐六年九月，華廷傑記葉志詵時「迎養在署」。⁵⁵ [清]華廷傑：〈觸藩始末〉，《第二次鴉片戰爭》，第1冊，頁166。

⁵⁵ 清代扶乩常借親友進行。王見川：〈清末的官紳與扶乩：兼談其時流行的讖言〉，《媽祖與民間信仰：研究通訊（2）》（台北：博揚文化，2012），頁34–47；鄭西迅：〈晚清的官紳與扶乩補論〉，《善書、經卷與文獻（十一）》（台北：博揚文化，2024），頁233–262。

至此，可以確認檔案中的這些記錄或由葉名琛直接產生，或與他本人密切相關，保存已久。從時間分佈來看，自咸豐元年起至咸豐七年止，葉名琛對扶乩、占卜始終樂此不疲，且深諳此道。七件記錄裡，兩件是僚屬主動呈覽請教，一件經葉名琛授意上稟，這些官員的地位均不高，但對其喜好相當瞭解，可見這幾乎成為當時官場公開的秘密。總體而言，這些預測未來的嘗試多發生在情況危急的戰時，且預言結果與實際的歷史發生非常接近。這些材料成為理解葉名琛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表現的基礎。

三、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葉名琛祈神史料解讀

咸豐七年十一月十二日（1857年12月27日），英法聯軍指揮部已正式下達進攻廣州城的指令，⁵⁶而葉名琛仍認為聯軍不會輕舉妄動。當日，南海縣縣令華廷傑往見，葉名琛稱：「十年前一切新聞紙我全收起，現探得伊國王有旨，飭令兵頭不可妄生事端，仍以生意為重。」面對布政使江國霖探報是否可信的詢問，其頗為自負地答道：「如不可信，亦不能支持至今。」「從前林文忠公好用探報而反為探報所誤，偏聽故也。我則合數十處報單互證，然後得其端緒。」且報單之外，「各處神籤亦無不吉」。⁵⁷

華廷傑與葉名琛關係極洽，由葉名琛上奏自香山縣知縣調補南海縣知縣，⁵⁸南海是廣東省首縣，故這次調任實是升職。因為仕途助力及平日往來，華廷傑對葉名琛頗懷感念。葉於國外病故，靈柩返粵之時，記云：「予先至船省視，憂從中來，不覺撫棺大慟，亦不特知己之感而已。」⁵⁹〈觸藩始末〉雖為光緒十一年（1885）刊，但前輩學者已注意到，華廷傑「對於英人侵佔廣州的經過，不但親經目睹，並且因職務關係，也參加了當時的對英交涉。書中按日記載，當是根據他自

⁵⁶ 夏笠：《第二次鴉片戰爭史》，頁270。

⁵⁷ [清]華廷傑：〈觸藩始末〉，《第二次鴉片戰爭》，第1冊，頁179。

⁵⁸ 〈奏請將香山縣知縣華廷傑調補南海縣知縣事〉，咸豐五年六月二十日，錄副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03-4109-103。

⁵⁹ [清]華廷傑：〈觸藩始末〉，《第二次鴉片戰爭》，第1冊，頁185。

己的日記」。⁶⁰因此，此處所記葉名琛在戰前的諸種乖謬舉動，並非抹黑，更多是出自當日的實錄。

其中「各處神籤亦無不吉」一語，更有其他敘述可以佐證。在十一月十一日，葉名琛還有意與西人斡旋。英方全權代表額爾金伯爵（James Bruce, Eighth Earl of Elgin）記載說：「葉名琛又送來信，信中內容比前一封更多。他們說他整天忙於向一尊偶像獻祭，這尊偶像代表著『物理之神』（the God of Physic），其造型設計使得它手持的木棍能在沙地上描繪圖案，而葉氏能從這些描繪的圖案中解讀出自己的命運。」⁶¹額爾金的描述非常像一位不了解扶乩的外國人轉述的相關情景。「物理之神」具體所指不詳，但神像手中握住木筆扶乩是常見的一種扶乩形式，⁶²而「各處神籤」與「整天忙於向一尊偶像獻祭」，指向更是一致的：戰前不久，葉名琛在祈神一事上花費了大量時間。

十一月十三日，英、法聯軍發動總攻，不久破城。二十日夜，華廷傑再往見，葉名琛「猶言過二十五日便無事」。只是到二十一日，葉名琛便被俘，「初上觀音山，至傍晚，復乘肩輿走城牆出東門，送上火輪船」。同日，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巡撫柏貴等亦被英人掌控，留在觀音山。⁶³

十一月二十三日，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巡撫柏貴，副都統雙禧、雙齡，粵海關監督恒祺，布政使江國霖，按察使周起濱等聯銜上奏，

⁶⁰ 〈第二次鴉片戰爭書目解題〉（上），中國史學會主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1冊，頁172。

⁶¹ 中譯參額爾金著，汪洪章、陳以侃譯：《額爾金書信和日記選》（上海：中西書局，2011），頁49。此處翻譯參照英文原文有改動。翻譯及解讀均承匿名專家賜教。

⁶² 英方對葉名琛的舉動一直非常關注，咸豐七年二月初五日（1857年2月28日），《北華捷報》報道稱葉名琛曾組織人在工廠舊址附近犁地並播種鹽巴，據說這意味著讓外國人從中國徹底消失。“Communicated,” *The North-China Herald*, 28 February 1857, 2–3. 參郭曉瓊：〈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1856–1860）《北華捷報》報導熱點與對華戰爭輿論塑造探究〉（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頁23。

⁶³ [清]華廷傑：〈觸藩始末〉，《第二次鴉片戰爭》，第1冊，頁184。華廷傑的這段記述得到英方史料的支持，黃宇和：〈全球一體化旋風中的近代中國：從葉名琛檔案談起〉，《葉名琛檔案》，第1冊，頁1–3。

述說英法軍突入廣州城、擄走葉名琛事。⁶⁴此時大小官員多處於拘禁狀態，故此奏背後實有英人因素。華廷傑對該奏背景有著詳細記錄：

敵酋逼令撫憲參劾葉相，時即非被逼，勢亦不能不奏。於是將軍與撫憲、都統會銜，並帶敕兩司銜，由六百里加緊具奏。大意謂自洋務開釁以來，皆督臣一人主持，從不與同官商議。至十一月十一日，聞該夷有一照會前來，系六條官銜，督臣並不給與同閱。十三日，忽聞開炮。十四日，被該夷占踞觀音山。二十一日，突至督署，拉督臣下其船，而請臣等上觀音山說話。其餘略聲敘前後實事，末則請旨從嚴治罪耳。⁶⁵

華廷傑所述與奏摺內容相符。原奏稱：「不意冬月初一日，各夷船數十只駛進省河，督臣傳諭，該夷如無動靜，兵勇毋許挑釁。」相持數日，後來英人於初九日、十二日送來五銜照會，「督臣仍未通知」，「十三日炮聲四起，督臣始調各鄉團練，未能齊集」，「至十四日辰刻，城內觀音山北門內外各炮臺，遽為該夷所踞」。⁶⁶其中關鍵，在於葉名琛在英人炮擊廣州之時始調團練，可知其在防守上確有疏漏。

相當奇怪的是，時任上海道台吳煦（1809–1872）的私人檔案中收有一份奏摺抄件，同樣關於葉名琛被俘事，但言辭極為激烈，起首便是：「臣等奏，粵省督臣葉名琛辱國失身，天怒民怨。謹將其始終乖謬，巨細縷陳，恭摺奏祈聖鑒事」。接著歷述葉名琛釀禍、忌刻、殘忍、貪鄙、邪癖、乖張六大罪狀。其中「貪鄙之罪」條，點名斥責葉名琛倚為「股肱」的多位官員，其中便有「草菅人命、凌辱紳民、貪賂肆行之華廷傑」。⁶⁷「邪癖」之罪條更稱：

⁶⁴ 〈廣州將軍穆克德訥等奏英法軍突入粵城擄去總督並拘禁巡撫等情形摺〉，咸豐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國史學會主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3冊，頁130–131。

⁶⁵ [清]華廷傑：〈觸藩始末〉，《第二次鴉片戰爭》，第1冊，頁186。

⁶⁶ 〈廣州將軍穆克德訥等奏英法軍突入粵城擄去總督並拘禁巡撫等情形摺〉，咸豐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國史學會主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3冊，頁130。

⁶⁷ 〈參奏粵督葉名琛辱國失身及其始終乖謬情形摺〉（抄件），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吳煦檔案選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第4輯，頁190。

既當軍餉急需之際，而有餘力偁建長春仙館於觀音山，築小蓬仙館於芳村，浪費民力，動至十餘萬。隨其父葉志詵招集道眾數十人，朝服禮拜，惑眾誣民，凡舉大端，皆決於仙館中。三尺童子，皆指其妄。

大臣柄國果如是也？⁶⁸

「小蓬仙館」為道院。光緒十三年(1887)，兩廣總督張之洞命廣東布政使將之改建為祭祀林則徐等七位名宦的「七公祠」。改建札文稱仙館是葉名琛為父親建造，其父「雅慕神仙，於院中供奉王子晉(王子喬)、呂純陽(呂祖)、李青蓮(李白)三木主」。張之洞認為「詩人羽客，錯出不倫」，「崇尚虛無，罔資觀感，甚非守吏以道導民之誼」；且該館為葉名琛合眾捐銀興修，不應據為方外私業，故當改建，並將原設木主移入別處道院。據小蓬仙館內道士稱，該館創建時捐集銀共八萬餘兩，⁶⁹與摺中「浪費民力，動至十餘萬」，似相當切合。

該奏接著闡述「全省紳民之大惑難解者」多條。第二條稱葉名琛「置蒼生於不問，賴群小而貨敵，惟鬼神是依，借仙讖以慰民望，猶思赦賄漢奸，徒思掣肘外夷，不慮滋生內患，何拙也」。第三條述十一月情形，與前引奏摺相似，稱：「待至七年十一月初旬，英夷誘佛蘭人同為不軌，以數號兵船先入內河，遞到照會，商聞壹宜，並有撫臣、督臣、將軍、關部、督統五銜二次，而督臣皆匿而不宣。撫臣詢之，則以專任夷務為己任。凡事不會商，司、道詢之，則云可放一萬二千個心；兩首縣詢之，則云可結保其無事；紳士入見，直是只談風月，令人無從置喙。」且當人情洶洶之時，「督臣猶汲汲自為十一月

⁶⁸ 〈參奏粵督葉名琛辱國失身及其始終乖謬情形摺〉(抄件)，《吳照檔案選編》，第4輯，頁191。

⁶⁹ 〈札東藩司改小蓬仙館為七公祠〉，光緒十三年四月三十日，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5冊(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頁120。此札還提及小蓬仙館屋宇僅止數間，該館道士曾刊佈訴詞，捐集銀兩有不少似為承辦人馮華彬、馮暉谷等貪污。此處可能是為葉名琛諱飾，銀兩更可能直接被葉氏父子吞沒。清末筆記《見聞瑣錄》稱葉氏父子「納賄賣缺，門庭如市。每年生辰，廣受禮物」，又記：「葉有銀五六百萬兩，託伍家放洋行內生息。」關於扶乩事，則記：「父子酷媚鬼神，署後一樓，云有狐仙居其上，日敬事之。」歐陽昱著，恆庵標點：《見聞瑣錄》(長沙：嶽麓書社，1986)，頁147。歐陽昱，江西宜黃人，同治十二年(1873)拔貢，活躍於同治、光緒年間，其自稱「足跡半天下」，「所至必採訪當世事」，「每下筆有所疑，輒遍詢知交，如一辭確然可錄而後錄」(同上書，頁3〈序〉)，其中所述葉名琛事蹟雖已參照《觸藩始末》等文獻，但大概仍可資參考。

廿三拜壽之舉，凡人入告者，皆旬日當了事為辭」。被俘之後，「因在夷船日食面頭三顆，竟恬不知恥」。此奏最後以「試問葉名琛清夜思之，何以對百姓，何以對天下，何以對陛下，何以對宣宗成皇帝在天之靈也。是皆目擊情形，據實具奏。乞祈聖鑒」作結。⁷⁰

這件奏摺信息量極大，所述「惟鬼神是依，借仙識以慰民望」，「兩首縣詢之，則云可結，保其無事」，皆可與前文互證。「督臣猶汲汲自為十一月廿三拜壽之舉」，亦與葉名琛十一月二十三日的生辰相合，⁷¹葉之所以汲汲於此，大概是因為壽辰可收受紳士們的銀錢禮物。而其中披露的「隨其父葉志詵招集道眾數十人，朝服禮拜，惑眾誣民，凡舉大端，皆決於仙館中」，更是關鍵。故此前已有不少人注意到這件奏摺，⁷²並用以論證葉名琛篤信扶乩之事，但似乎沒有完全理清奏摺背景。

據折內葉名琛「今因在夷船」之語，可知此奏作於葉名琛被俘後不久。咸豐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湖南巡撫駱秉章曾奏報英人襲擊廣州後，廣東各折件過境日期，稱：「督臣葉名琛自前月十二日拜發六百里後，惟廣州將軍、廣東撫臣於二十三日及二十九日拜發六百里兩件。」⁷³這裡提到的十一月十二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十一月二十九日三件六百里加急奏摺，第一件為葉名琛任上所奏，第二件即為前述聯銜奏摺，第三件為恒祺奏，「擬請令柏貴先議辦夷務」，⁷⁴均與此奏不符。若查此時期軍機處隨手登記檔，也沒有關於這件奏摺的任何記錄。因此，這是一件未曾上奏的奏摺。

⁷⁰ 〈參奏粵督葉名琛辱國失身及其始終乖謬情形摺〉（抄件），《吳煦檔案選編》，第4輯，頁192-194。

⁷¹ 黃宇和：《兩廣總督葉名琛》，頁4。此頁印有《葉氏宗譜》中「葉名琛」條的原書書影。

⁷² 河南地文化學社：〈一張廣州老照片引發的地理疑案〉，《信息時報》，2013年6月29日，D8版；陳曉平：〈晚清名人與小蓬仙館〉，頁59。前文認為這出於「一群廣東京官聯名上奏」，後文則認為是「一群京官聯名奏參」。

⁷³ 〈湖南巡撫駱秉章奏英法襲踞粵城傳聞異詞照鈔粵商寄楚信緘呈覽摺〉，咸豐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國史學會主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3冊，頁138。

⁷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軍機處隨手登記檔》（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咸豐七年，頁219、266、309。

細讀此奏，其中自稱「臣」而非「奴才」，據奏摺體制，不可能為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廣東巡撫柏貴以及粵海關監督恒祺等滿人所寫。當時廣州城內，捨此而外的在任漢人官員如布政使江國霖，雖有奏事權，也不可能越級上奏。何況，該奏痛詆葉名琛，直接點名不少與之關係親密的官員，但絲毫不提具奏者之責任，有違官場處事規則。因此，該奏不會出自廣州各官員之手。而末句「是皆目擊情形」之語，又說明這不可能出自京官之手，否則便是欺君。⁷⁵

據華廷傑記載，十一月二十三日的聯銜奏摺，是英人授意巡撫柏貴所上。那麼，這件奏摺會是出於英人授意嗎？似乎不可能。英人佔據廣州城之後，勒令「各兵勇在城內者均不准穿號衣及持帶器械，不准聲稱『番鬼』二字」，⁷⁶但這一奏摺痛罵葉名琛之餘，對英、法等國毫無恕辭，「逆夷逞凶，因小釁而構大難」、「犬羊之性，貪得無厭」之語屢見。⁷⁷而且，葉名琛此時已被送上輪船，英人再沒有他會復任的憂慮，奏摺通篇也未提出任何有益於英人之要求。這樣一件奏摺，對他們來說並沒有意義。

排除廣東、京城官員與洋人，這件奏摺的潛在作者，便只有地方紳士。摺內頻繁出現的「吾粵民凋殘實自此始」、「無怪乎全省紳士之大惑也」等表述，也最可能出自這一群體之口。⁷⁸上海道台吳煦的情報工作涉及面極廣，⁷⁹其檔案中多有同時期從廣州寄來的信件、探報，其

⁷⁵ 以普通驛遞速度計，廣州到北京需時30至35天，而葉名琛在咸豐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被囚，咸豐八年正月初十日該艦即離開香港。此奏即時性非常強，這也說明不太可能是京官得到廣州消息後擬就。驛遞速度參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頁161。

⁷⁶ 〈湖南巡撫駱秉章奏英法襲踞粵城傳聞異詞照鈔粵商寄楚信緘呈覽摺〉，咸豐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國史學會主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3冊，頁139。

⁷⁷ 〈參奏粵督葉名琛辱國失身及其始終乖謬情形摺〉（抄件），《吳煦檔案選編》，第4輯，頁193。

⁷⁸ 1930年代編撰的《廣州城坊誌》卷二記：「咸豐初，總督葉名琛，其父迎養在署，崇信卜術，改其處為長春仙館，金碧相輝，倍極偉麗。紳士之無賴者，簪冠道服，鑽營住持其間，以誘惑愚民，鑼鼓不絕。」所記與奏折中所述頗相合。黃佛頤編纂，仇江、鄭力民、遲以武點註：《廣州城坊誌》（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頁143。

⁷⁹ 有學者判斷：「大致可以認為吳煦有自己的情報網絡，雖然不是很完善。」任智勇：〈咸同之交江南的戰局與政局：以吳煦為中心〉，《清史研究》，第3期（2024），頁45。

中真假參半。⁸⁰這件未上的奏摺，當時應在民間廣泛流傳，為吳煦線人得到後錄呈。因此，這件奏折反映的實是當時城內士紳的看法，敘述採用的奏折體式以及末尾「是皆目擊情形」之語，更強化其內容的可靠性。⁸¹

而且，這件奏摺中所言葉名琛以扶乩指導決策事，確實是地方士紳共有的觀念，如大儒陳澧在避亂期間曾記其心緒：

《魏書·裴粲傳》云云，前時抄此條，非有所指，乃近日葉相國之於夷寇，正復相類，為之慨然。戊午正月六日書。

《北史·穆壽傳》：蠕蠕吳提將來犯，壽信卜筮，謂賊不來，竟不設備。吳提果至，京邑大駭，壽不知何為，信卜筮謂賊不來而不設備。葉相似之。

《北史·公孫質傳》：穆壽雅信任質為盟主。質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蠕蠕必不來，故不設備，由質幾敗國。今復見此事，讀此為之憤恨。⁸²

「戊午正月六日」即咸豐八年(1858)正月六日。陳澧原住廣州城內，城破後攜家眷避亂南海縣橫沙村，⁸³葉的舉動當出於其目擊。他在筆記中借北魏史事譏諷葉名琛，其中裴粲守城高談虛論，不事防禦；公孫質、裴穆則因占卜不設防致敗。其實，陳澧與葉氏一家相交已久。道光二十七年二月，葉志詵獲逐啟謚鼎，特意從北京寄示拓片，陳澧為此撰寫跋尾。⁸⁴如果不是憤恨於葉名琛之所為，又何必私下攻擊故人。

⁸⁰ 如其中一件咸豐七年十二月左右的情報稱：「廣東省城經南海縣華明府為首，糾約義勇數萬，於本月初一日黎明動手，將踞城夷兵殺死二千餘人。省河所泊夷船三十餘號聞信，斬碇開回香港。城內逃出夷兵，皆投黃埔。」便都是不實之語。〈滬商接到粵信(一)〉(1858年1月)，《吳煦檔案選編》，第5輯，頁277。

⁸¹ 承裘陳江老師提示，另有一種可能，此奏是休致在鄉的官員所寫。但無論如何，都應該出自廣州地方。

⁸² 黃國聲、李福標：《陳澧先生年譜》(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頁132。陳澧還撰有《失題》詩三首責葉名琛，參黃國聲：〈鴉片戰爭詩歌三題〉，《晚清民國文學研究集刊(一)》(桂林：灝江出版社，1995)，頁117-119。

⁸³ 黃國聲、李福標：《陳澧先生年譜》，頁129。

⁸⁴ 同上註，頁75-76。

結合額爾金、華廷傑、匿名奏摺及陳澧等人的記述及其語境，可以確證葉名琛在守城期間進行扶乩、求籤等活動，原可用以籌備戰守的時間因此大量消耗，而預測未來得到的樂觀結果，使得他更為放鬆，尤其在此前種種占卜、扶乩結果都與實際歷史發生相去不遠的前提下。本文無意誇大求神問卜對葉名琛政治決策的影響，只想指出其中的相關性。⁸⁵

從葉名琛被俘後的舉動，也可看出他與扶乩的關聯。據華廷傑記，咸豐八年正月初四日，被俘獲多日的葉名琛手書一紙，「取須用衣服飲食各物俱備，內有呂祖經一本」。⁸⁶呂祖與關帝、文昌帝君類似，是清代最重要的乩壇神祇之一。⁸⁷據書名，大概可知該書是託名呂祖降乩寫成，以治心行善為指歸。⁸⁸當年正月二十日，額爾金記下過葉名琛對待《聖經》的態度，稱：「正如葉名琛所言：『那本書（《聖經》）我讀過，是本很好的書。先教人如何為善，跟佛經沒什麼兩樣。』」⁸⁹與額爾金相同，柯克也記下葉名琛對《聖經》的看法：「葉說他很久以前就讀過《聖經》；它是一本好書——所有這類書籍都是好的——它們能淨化人的心靈，佛教、道教的書籍也是如此。」⁹⁰從教人為善的角度看，《呂祖經》與《聖經》沒有太大分別。

⁸⁵ 相較而言，葉名琛對當時外交情勢的認知，更多起到決定作用。茅海建：〈入城與修約：論葉名琛的外交〉，頁73-92。殷晴的新近論文精彩地論證了葉名琛在軍事信息收集和分析上存在嚴重缺陷，其形勢判斷主要基於密探提供的消息，而探報多有不實之處，這是廣州城未經抵抗便被聯軍輕易攻佔的原因之一。參殷晴：〈戰爭如何被感知？——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信息的收集、傳遞與擴散〉，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編：《出使專對：近代中外關係與交涉文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頁10-15。

⁸⁶ [清]華廷傑：〈觸藩始末〉，《第二次鴉片戰爭》，第1冊，頁184。道光二十六年，何紹基記：「見葉氏藏《度人經》甚舊。」毛健、堯育飛整理：〈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何紹基日記》，第2冊（長沙：嶽麓書社，2023），頁582。此處言「葉氏」，本年與何交往較密且有收藏愛好之「葉氏」似只有葉志詒、葉名琛父子。

⁸⁷ 參黎志添：〈清代四種《呂祖全書》與呂祖扶乩道壇的關係〉。

⁸⁸ 酒井忠夫著，孫雪梅譯：《中國善書研究（增補版）》，下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頁207。

⁸⁹ 額爾金著，汪洪章、陳以侃譯：《額爾金書信和日記選》，頁65-66。

⁹⁰ Cooke, *China: 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58*, 409.

柯克與葉名琛同船時，還記下過葉祈禱的姿態：「他的祈禱包括以中國神像的姿勢盤腿而坐，面朝東方。他保持這種抽象狀態大約十分鐘，祈禱的行為就完成了。他剛上船時，每天都要進入這種沉思狀態好幾次。」葉名琛不用神像，當被問及他是否希望有一些便利條件讓他私下做禱告時，他回答說什麼也不需要。柯克本以為這是佛教高階教派的禱告行為，但有一天，葉名琛心情愉快之時，解釋自己為什麼朝向東方而非佛陀的出生地西方。因為東方代表著生氣，是生的原則。⁹¹柯克非常疑惑，與葉名琛接著對話：

這是什麼道理 (Taoli)，儒家的嗎？是的。

佛家的嗎？是的。

道家的嗎？是的。它比儒家還要古老。它是中國的古老禮儀。

儒、佛、道的道理都從屬於中國古代的道理嗎？是的，它們都在其中。從有東方開始，便有這種道理。⁹²

道教喜生惡死，最愛生氣，葉名琛沒有明言，但這大約符合道教教義。而其言辭中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傾向，正是明清以來民間信仰的主流，尤其表現在扶乩之上。⁹³

英艦逐漸駛抵印度東部的加爾各答，不久，咸豐九年 (1859) 三月初八日，葉名琛在此病故。⁹⁴咸豐十年 (1860) 十一月，葉志詵見何紹基，說其子「被夷人載去，不食，七日而死。乃地方官不肯據奏，止以病故上聞」，希望何紹基能夠為之作傳，⁹⁵無果。咸豐十一年 (1861) 十月，何紹基再見葉志詵，發現其「聾老殊甚，不似前月之健」。⁹⁶在戰敗一事上，這位偕子扶乩的老人當然需要承擔責任，悲痛在所難免。兩年之後，葉志詵也去世了。

⁹¹ Cooke, *China: 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58*, 402.

⁹² Ibid.

⁹³ 酒井忠夫著，孫雪梅譯：《中國善書研究（增補版）》，下卷，頁206-298；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⁹⁴ 〈署廣東巡撫畢承昭奏葉名琛在印病故英官護送其棺柩到粵片〉，咸豐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國史學會主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4冊，頁67。

⁹⁵ 〈咸豐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毛健、堯育飛整理：《何紹基日記》，第4冊，頁1385。

⁹⁶ 〈咸豐十一年十月二十日〉，毛健、堯育飛整理：《何紹基日記》，第4冊，頁1478。

餘論：晚清的精神世界

中國歷史上本有占卜用兵之傳統，甲骨卜辭便是如此。到秦漢時代，占卜技術已較成體系，大致可分出三個系統。一是與天文曆算有關的星占、式占，二是與動植物崇拜相關的龜卜、筮占，三是與人體生理、心理、疾病相關的占夢、厭劾、祠禳等術。⁹⁷這些占卜技術日後不斷演化，唐五代敦煌文書中的不少占卜記錄不出這三大體系，但具體手段更為細分。⁹⁸葉名琛常用的六壬式占在敦煌占卜文書中便相當多見，可達到「占賊來否」、「占遺物知可得否」等種種目的，儘管具體排卦方式有所不同。⁹⁹而扶乩則基本是宋代發展起來的。北宋中期，扶乩在士大夫中已較為流行，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前，開封已出現以扶乩為主的宗教團體。¹⁰⁰

到19世紀中葉，六壬式占與扶乩都已十分流行。咸豐三年，吏部侍郎沈兆霖日記載：「馬彥字君實，桐城生員，候選兵馬司吏目，精風角、六壬」，「其占六壬，與世所用三傳四課異，出於《六壬金口訣》」。¹⁰¹可知有「三傳四課」的世傳典範存在，頗可說明時人的熱衷。

一個更微妙的例子，仍與兩廣總督有關。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勞崇光卸任兩廣總督。臨行前向接替者劉長佑推薦一批下屬，在信末尾寫道：「內中有潘順者，太乙、奇門、六壬、子平選擇，皆粗知梗概，皆弟所指授也。行軍有時用得著，故附及之。」¹⁰²兩任總督的交接信函以此作結。以今人的眼光看，也許會感到困惑。但是，對

⁹⁷ 李零：《中國方術正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67。

⁹⁸ 黃正建：《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頁16-19、22-24。

⁹⁹ 同上註，頁30。

¹⁰⁰ 許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1941年初刊），頁8-24；王見川：〈宋—明時期的扶箕、扶鸞與請仙：兼談「扶乩」「恩主」等詞的起源〉，收入范純武主編：《扶鸞文化與民眾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博揚文化，2020），頁53-88。

¹⁰¹ 〈咸豐三年十一月初三日〉，《沈兆霖日記》，收入張劍、鄭園整理：《晚清軍機大臣日記五種》，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9），頁491。

¹⁰² 〈同治元年十二月初三日 勞崇光致劉長佑 上劄之附〉，王新才等編：〈勞崇光卷下〉，《武漢大學圖書館館藏晚清名臣手札》，第三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24），頁653。

葉名琛、勞崇光、劉長佑而言，變動不居的戰局是眼下的最大挑戰，必須儘可能地掃除其中多餘的、不利的諸種可能性，這些預言手段因此而重要。勞崇光信中略顯得意的「皆弟所指授」之語，與葉名琛的表現何其相似。多任兩廣總督都是如此，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廣東的特殊性。不過，葉名琛是湖北人，勞崇光、劉長佑是湖南人，這些預言技術其實沒有太多的地域色彩，而是遍佈全國。

扶乩同樣如此，其在官紳中的廣泛接受程度，以及影響的地域面之廣，學界大致已有共識。¹⁰³廣州西樵山上有雲泉仙館，向祀呂祖，為扶乩的重要場所，其建造始於道光二十七年，¹⁰⁴告竣於咸豐八年。咸豐十年，作為營建發起者之一的翰林院編修馮贊勳撰文為記，書碑者即為署廣東巡撫江國霖。¹⁰⁵江國霖親歷葉名琛身敗之事，仍行此舉，足見其時社會風習，¹⁰⁶其他地域同樣如此。如前引馬永熾南昌守城時期乩語，所請三位神明，土地自是地方神，許遜為江西北部本土神，文天祥亦是江西人，可見請乩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這是儀式在地方扎根的直接證明。從葉名琛父子與扶乩的關聯來看，葉家應該是熱衷於扶乩的奉道世家，葉名琛的故事為我們理解道教在政治、社會中的作用，提供了一個具體而微的個案。

更進一步說，扶乩與占卜背後蘊含著的是類似的社會心理。¹⁰⁷咸豐十年七月，大學士彭蘊章為勸阻咸豐帝親征巡幸木蘭而奏稱：「再臣

¹⁰³ 清代官紳扶乩的相關史料目前存量不少，但若以佔比計，仍不能算多，而部分特別熱衷扶乩者所留下的史料，也許存在著強烈的「倖存者偏差」，因此很難切實討論其接受程度。不過，光緒二十三年（1897）的一個例子可以參照。當時，吳樵去世，其親友在葬禮後扶乩，與其亡魂對話，後將所得乩語寄贈吳樵好友汪康年，汪康年又轉寄多人。因此，不少原與此無關的士人捲入其中，對乩語發表意見，所持意見有正有反，人數大致持平。王見川最早注意到這一事件，之後筆者有進一步討論。王見川：〈清末的官紳與扶乩：兼談其時流行的讖言〉；鄭西迅：〈晚清的官紳與扶乩補論〉。王見川此文還指出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的軍事行動與扶乩可能存在關聯，儘管這種關聯不很明確。

¹⁰⁴ 一說1838年，志賀市子著，宋軍譯：《香港道教與扶乩信仰：歷史與認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頁146。

¹⁰⁵ 黎志添、李靜編著：《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下冊（香港：中華書局，2013），頁912-914。

¹⁰⁶ 近代廣州地區的扶乩情形，可參志賀市子著，宋軍譯：《香港道教與扶乩信仰：歷史與認同》，頁145-250。

¹⁰⁷ 細究起來，時人對待扶乩、占卜的態度可能仍有差別，此處暫不展開。

於四月初六日，隨扈祈穀壇，散值時，恭詣關聖帝君廟求籤，占夷務，有『此事先凶後吉』之解，又有『吳山頂上好鑽龜』之句，似將來議和，仍在上海，然非大勝而退之，何能先凶後吉，又何能在上海議和耶？神明斷不欺人，敬將靈籤粘呈御覽，伏乞聖鑒。再所以不早具奏，以解有『藏器待時，不可躁進』之語，今則時哉弗可失矣！所謂『掀天事業，時至即為』者，臣不能為，願我皇上奮發為之也。」¹⁰⁸ 彭蘊章此奏以神明壯其聲勢，意在勸阻咸豐帝出京，說明神明之口述預言之事是用以論證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不會引起太多的詫異。

這裡所舉的例子多少都與戰局有關，但並不能說，戰局導致這些預言技術的流行。毋寧說，戰局讓這些歷史潛流得以浮現。相關預言手段，都有極日常的一面，如葉名琛檔案中的乩語就有令請乩者戒除鴉片的指示。

由此，至少可以從兩個層面解讀葉名琛的預言體驗。在政治史層面，葉名琛的例子特別有助於理解實際政治運作中的非理性因素，尤其是以社會史視角觀察政治史的展開。從這些持續不斷的占卜記錄中，不難感受到葉名琛面對未知世界的焦慮與恐慌，而持續占卜養成的路徑依賴，最終或許也推動悲劇的釀成。當然，如果不執著於在預言與決策方面建立直接因果關係，還有更多理解葉名琛舉動的角度，即作為決策者，不守城的決定，乃至此前的許多政治軍事抉擇，對葉名琛而言都重大且困難。他需要更有力的方法去說服自己、同僚、下屬與民眾，扶乩、占卜正充當著這樣的說服工具。現實生活中，這也是屢見不鮮的現象。¹⁰⁹ 觀察晚清的歷史展開時，我們需要更具整體性的眼光。

¹⁰⁸ 〈大學士彭蘊章奏〉，咸豐十年七月二十七日，王崇武校錄：《咸妥瑪所盜竊之中國檔案（鈔本）》，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2冊，頁482-484。

¹⁰⁹ 此點承匿名審稿專家直接提示。關於葉名琛檔案中預言文書保留的邏輯，審稿人指出：「扶乩本身是一個相當強調即時性的宗教實踐，而扶乩預言的文字記錄則是另外一回事，即記錄者覺得有必要把這些預言材料保留下來，那麼大概率就是因為它已經應驗了。放眼世界宗教史中的所有預言資料及其保留的邏輯，往往是因為原先給出的預言應驗了，所以信仰者就有極大的動力去記錄它。反過來也成立，那些沒有應驗的預言，可能就被信仰者選擇性地忽略了，但是它卻有一定幾率被反對者記錄下來作為攻擊的證據，葉名琛的個案不就很好地從正反兩方面都體現了這種宗教現象麼？」這一點同樣重要。

在社會史層面，葉名琛個案中的不被理解之處，反而具有常態的意蘊，這突出表現在相關史料的存留狀況上。本文據以討論此事的基本材料，均因第二次鴉片戰爭這一突發事件而得到披露。如果英人沒有繳獲這批檔案，今天就不太可能看到這些占卜記錄（且這些或僅占實存記錄的一小部分）；而相關各種記述的產生語境，也離不開戰敗的歷史背景，特別是地方紳士的指責言論，觸發的動機與落點就在戰敗。可是，葉名琛的扶乩、占卜行為持續時間極為漫長，且帶有半公開性質，尤其是為其父建造仙館，地方紳士能夠直接點出，可見這是人所共知之事。¹¹⁰但在戰前的史料中，實難以尋覓其蹤跡。這當然與史料散佚及葉名琛本人的失勢有關，但時人因觀念局限而不書或少書，也是原因之一。¹¹¹故而，認識到葉名琛舉動中異與常的雜糅，或許更能接近「真了解」（陳寅恪語）的層次。

「從根本言，古今不僅異言，且常處於不同的意義世界」，¹¹²跨越或縮短不同意義世界的認知距離，並非易事，但有其可能，就歷史學的取向來說，更是必須之事。達恩頓（Robert Darnton）直言：「看不懂一句格言、一個笑話、一個儀式，或一首詩時，我們知道其中必有通幽的曲徑。在文件最隱晦之處挑三揀四，或許能夠解開聞所未聞的意義系統。這樣的線索甚至可能引出令人嘖嘖稱奇的世界觀。」¹¹³葉名琛的舉動便是這樣一條「通幽的曲徑」，以往無論是就扶乩譏笑葉名琛，還是不遺餘力地為其辯護，其實都是以此為荒謬絕倫之舉，因而無視這當時為許多人共享的精神世界。

¹¹⁰ 梁其姿的研究注意到晚清廣州扶乩團體活動的私隱性，但這是相對而言，實際上，如省躬草堂之類的鸞堂都與地方公共事務關係密切；而志賀市子運用的材料大致已說明葉氏父子扶乩活動的公開性。志賀市子著，宋軍譯：《香港道教與扶乩信仰：歷史與認同》，頁192-193；梁其姿：〈道堂乎？善堂乎？清末民初廣州城內省躬草堂的獨特模式〉，收入氏著：《變中謀穩：明清至近代的啟蒙教育與施善濟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頁171-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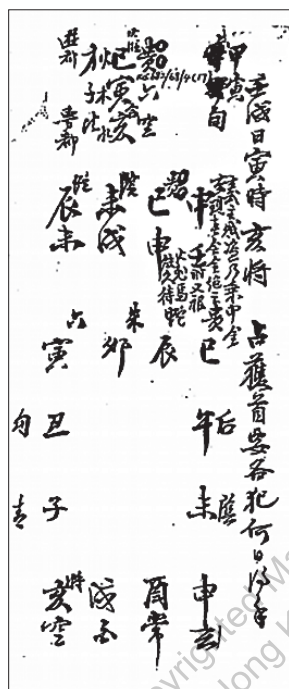
¹¹¹ 還有一些情況，是當時人以為的「常態」，在後人處卻成為「變態」，因此造成史料減損。一個例子是謝家福日記的稿本與清本差異，稿本中的許多扶乩記錄，在清本中被後人全部刪去。李軍、顧霞：〈謝家福著作編訂考略——以謝氏日記稿抄本為主〉，《蘇州文博論叢》，第3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121-127。

¹¹² 羅志田：〈往昔非我：翻譯、訓詁與歷史文本解讀〉，《文藝研究》，第12期（2010），頁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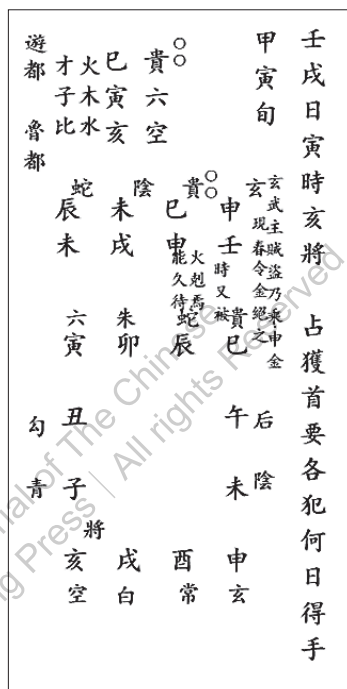
¹¹³ 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著，呂健忠譯：《屠貓記：法國文化史鉤沉》（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3。

附錄：「葉名琛」檔案所見扶乩、占卜記錄¹¹⁴

(a) FO931/1596



原圖 1



重製圖 1

三傳得一氣相生，乃水生木，木生火，生出貴人。正應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象。玄武主盜賊，乃乘申金，現春令，正金絕之候，出傳乃巳火剋申金，課格乃元首之課，沉巳火又有生助。應在春分後，賊氛必盡數消滅。首要斷不能免脫，定遭擒獲。此課貴人乘初傳，自下層之生上，必得高官顯爵、位極一品之兆。賊氛又被貴人剋住，焉能逃脫，雖玄武乘申金落於亥宮，好得太陽在亥，正當令之時。賊雖藏匿甚秘，必不能遁也。總應在初六、初九、十二、十八、廿一、廿九等日，首要各犯必陸續就獲。斷無疑矣。

¹¹⁴ 本部分由錄文及解析兩部分構成。解析部分，僅就葉名琛本人的占卜文書展開。僚屬所呈文書的占卜原理與文章主旨稍遠，姑不論。

初九已應，獲鄧三爵、林三槐。

十九日已應，獲黃毛五。

逢丙日必得手。初九丙寅、十九丙子俱得要犯。若廿九丙戌再應，則此課占斷靈驗極矣。

廿二日報獲劉天成。

三月初九獲羅恩滌。

三月十九必全局了事，可以凱旋矣。

【解析】此件為六壬式占記錄，主要由排盤圖與解語兩部分構成。以下就六壬排盤原理，解釋占卜圖繪製過程。¹¹⁵明確占卜時間後，首先要佈定天盤。天盤排佈與地盤對應，以天盤當值月將對應地盤占時，即以「亥(將)」對應「寅(時)」。「由於地盤宮位靜止不動，在壬式的書寫中，一般不寫地盤，僅標天盤」，¹¹⁶以下還原占卜圖中略去的地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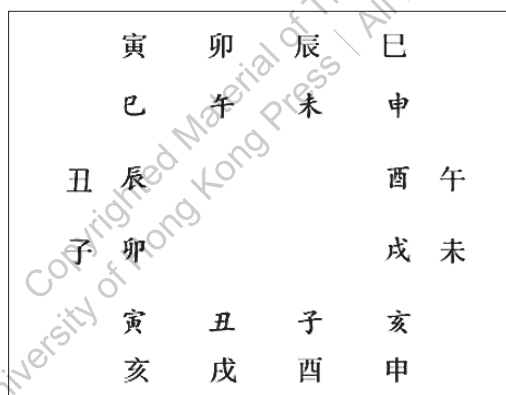


圖 1.1 地盤天盤

圖 1.1 內圈為固定不變的地盤，外圈為相應的天盤(對應原圖 1 下部)，均按十二地支排列。

天盤定，接著根據日辰排出四課。壬戌日，日干為壬，支辰為戌。壬日寄於地盤亥宮，亥的天盤上神為申，將申書於壬干之上，所

¹¹⁵ 以下所據原理，參劉科樂：《六壬時空》，頁 44–115。未免繁瑣，不一一出註。

¹¹⁶ 同上註，頁 65。

得申壬，是干陽課，為四課中第一課。支陽課取地盤戌上之天盤神未，將未書於日支戌上，所得未戌，是支陽課，為第三課。再將干陽課上「申」橫書於其左，申之地盤本宮上天盤神即巳，所得巳申，是干陰課，為第二課；將支陽課上「未」橫書於其左，未之地盤本宮上天盤神即辰，所得辰未，是支陰課，為第四課。如下圖所示（對應原圖1中部）：

辰	未	巳	申
未	戌	申	壬
4	3	2	1

圖1.2 四課

四課定，再根據四課的生克關係排三傳。辰、未、戌、巳、申、壬的五行分別為陽土、陰土、陽土、陰火、陽金、陽水，其中無下賊上者（下克上曰「賊」），只有第三課巳申為火克金，名為「元首課」，故以「巳」為初傳，巳上天盤神寅為中傳，寅上亥為末傳。巳為火，寅為木，亥為水。如下圖（對應原圖1上部）：

初傳	火	巳
中傳	木	寅
末傳	水	亥

圖1.3 三傳

天盤定，起課行傳之後，需要在天盤外層加天將盤，據此為對應課傳安天將。十二天將是貴人、騰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天空、白虎、太常、玄武、太陰、天后。佈天將盤需以貴人起，貴人又據日干而定，此課日干為壬，所處寅時為夜，故當以天盤「巳」對應天將盤「貴人」。¹¹⁷ 貴人臨地盤申宮，逆治，故十二天將依次逆行，如圖1.4：

¹¹⁷ 葉名琛此處的用法與一般有異，參劉科樂：《六壬時空》，頁110-111。

	六	朱	蛇	貴
	寅	卯	辰	巳
勾	丑			午 后
青	子			未 陰
	亥	戌	酉	申
	空	白	常	玄

圖 1.4 天將繞天盤

據此，可再標出四課天將乘臨圖，如圖 1.5：

蛇	陰	貴	玄
辰	未	巳	申
未	戌	申	壬

圖 1.5 四課天將乘臨

三傳巳、寅、亥乘臨同理，所對應天將分別為貴人、六合、天空。最後再為三傳標上六親，以日干壬為「我」，以「我」與三傳的生、克、比、和關係定六親，生我者為父母；我生者為子孫；克我者為官鬼；我克者為妻財；同我者為兄弟。壬為陽水，巳為陰火，寅為陽木，亥為陰水。壬克巳為妻財(才)，壬生寅為子孫(子)，壬與亥同為兄弟(比)，如圖 1.6：

遊	才	火	巳	貴	○
都					
	子	木	寅	六	
魯	比	水	亥	空	
都					

圖 1.6 三傳天將六親

圖中「遊都」、「魯都」，則為輔助判斷吉凶的神煞。至此，這一六壬課式圖的排盤經過解釋完畢。

按占卜者的解讀邏輯，解語起首有「三傳得一氣相生，乃水生木、木生火、生出貴人」語，即指初傳、中傳、末傳代表的亥、寅、巳分別為水、木、火，依次相生，巳對應的天將為吉神貴人，於占卜者利。四課中第一課的地支申對應玄武，玄武為兇將，主盜賊，然而彼時正當春令，春天旺木、相火、囚金，於玄武不利，反而有助於初傳巳火的火屬性，¹¹⁸故玄武被克，亂賊必然消滅。而且，此課貴人由初傳、中傳、末傳生出，節節攀升，顯為大吉。儘管天將玄武乘申金落於地盤亥宮，但受制於春令陽氣上升之時，且太陽在亥，玄武被太陽照破，盜賊因此無所遁形。¹¹⁹

(b) FO931/1506

立凡四兄大人閣下啟者。初二日，調楚勇四百名、保信勇三百名、章武軍一百餘名、九江兵四百名。弟與欽差江廉憲及林桂楣督戰策應，均於申刻出順化門，與賊交戰申酉戌三時之久，已殺長短髮賊數百名。我軍陣亡兵勇二十餘人，帶傷四十餘人，旋即收軍。初四日，賊用地雷轟城，城決二丈餘。楚勇救護，已殺賊四百餘名，並下城追擊，又復殺賊百多名，始將城垣保固，當即賞銀二萬兩。而江憲早防地道，先備月城，防其轟陷，此亦料敵之先著也。初六日，川兵已到五百名，在城外札營，湖南援兵一千五百名，二三日內亦可到耳。自楚勇到後，我之兵勇均已膽大，並不畏賊，陸續下城，生擒長短髮賊二百餘名。下城放火燒船，拆房燒房，所有四次交戰及守城兵勇共打死殺斃長短髮賊千有餘名，並聞馬鎮台帶川兵五千指日可到，賊勢甚屬窮促，即可一鼓擒之。謹得兩次請仙判語，抄錄，祈將此意轉達。（此信係六月初八日省城內馬永熾明府致。臨川縣專馬送永豐，十三日到永豐。昨由永豐轉遞吉水，十六日到）

土地到，真君許到。獨駕仙橋下碧窮，西江殺氣起城中。我來略使元機術，定把紅巾一掃空。

¹¹⁸ 劉科樂：《六壬時空》，頁155。

¹¹⁹ 參同上註，頁284。

問，省垣安危？莫愁莫愁，神仙元妙此難求。暫向軍中使小術，紅巾火炮打回頭。去。

再問，土地到。真君已上城樓去了？真君已去。問，真君已去，不知地道可保無虞否？乞上稟。

真君立刻回，不。真君已說明了，何用問。我亦要守城去。

鶴舞鴻飛會有期，諸君義氣滿雲霓。青天不使英雄困，且把除符仔細披。吾乃文天祥也。五月廿五日判。

問，江西省城安危？江西星野分牛斗，城郭氤氳鶴不巢。可笑紅巾來駐馬，欲逢甲乙戰同交。初二。

問，江西省城可守否？可守。問，甲乙字何解？甲乙日宜加意提防。

問，賊去否？現欲星散，因無援兵至，故外遲延耳。問，何時去？俟月城告竣時去。月城尚未竣。問，賊北竄否？北竄已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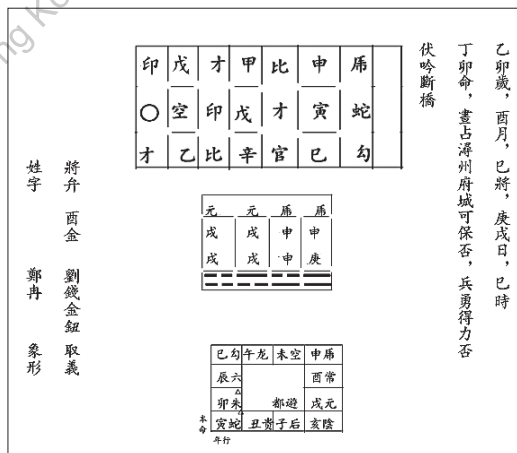
問，北京可保無虞否？無虞。問，江西各府無事否？無事。

問，各處援兵利否？利。(六月十八日江西發，七月初四日到廣)

(c) FO931/1580



原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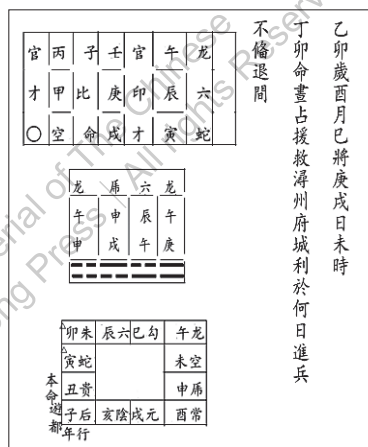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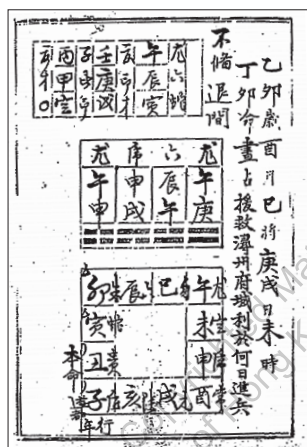
重製圖 2

伏吟課。憂悶之象。況中傳逢空，秋木真空(所憂在十八、十九及目下兩日，若至廿四五，可不憂矣)，謂之斷橋。以此推之，斷橋則

兵勇難以得力，伏吟則城中憂悶難免。必有不全之應。沉帛蛇入傳，賊勢頗猖獗。但酉宮為城廓，得太常加臨，必有酉金姓名之將弁（別號亦是）禦侮，於萬危之際而復其元。此雖有不全，而復之尚速耳。

【解析】六壬式占的排盤原理前已詳，不贅。此處課象是伏吟課，即「時、將同位，天地盤不動，天盤各居地盤本宮」，¹²⁰呈憂悶之象。而且庚戌日所處為甲辰旬，旬空寅、卯，中傳為寅（屬木），故稱「逢空」。謂之「斷橋」，是因其有中無主宰，廢於半途之意。

(d) FO931/1579



不脩課，如圓物有缺；方物只有三面，而缺其一之象。是應在潯州府城。現已危殆之極。問何日進兵，即須目下，不遑待矣。在本月二十四日巳前，可獲轉危為勝。蓋退間逢空，反以進論。是兵勇無可退步，只可進也。若二十四甲寅以後，勇氣不如前矣。論大局，須趁秋令進援，交冬則更難也。

【解析】此處課象為不脩課，因第一課為「午庚」，第四課為「午申」，「庚」即是「申」（都屬陽金），兩課相同，四課缺一課，故稱不脩。

¹²⁰ 劉科樂：《六壬時空》，頁90。

(e) FO931/1619

丙辰年正月廿一己卯日，癸酉時，雨水上元，陽遁九局。

占天下大勢何時清淨，應以

皇上為主，即以 天子事決之。

凡占 天子事，視坎宮，以 天子坐北朝南也。而離、兌、震三宮亦須參看，有奇有門有吉格，而頂盤又值吉星，則 天子享太平之福，即有兵革亦可消弭。此課丁奇休門會於坎宮，頂盤又值六合。解云：六合到坎主，宮中有喜慶，四海享太平。

□□□□□□可望平安□□□□門係伏吟，解云：伏吟吉山□□□，諸事無大轉動，值使在離南邊□□□□□□在震東□亦復安□□兌宮□□□□□□今□□來，恐西邊兵戈一時休息，不能細看□□北路□為妥協，有吉無凶。東南亦無大患，可以漸就平復，惟西路一帶尚難決其底定之日耳。鄙見如此，未知是否，伏求中堂鈞誨。

(f) FO931/1626

辛亥年十一月二十三甲戌日占得庚午時 父才兄 子未寅 甲申丙 蛇空后 勾發酉甲 陰丁卯 戊辰巳 庚午白 巳巳庚午白 辛未空 壬申青 癸酉勾 父才兄 子未寅 甲申丙 蛇空后 勾發酉甲 陰丁卯 戊辰巳 庚午白 巳巳庚午白 辛未空 壬申青 癸酉勾	計開 辛亥年十一月二十三甲戌日，占得庚午時 父才兄 子未寅 甲申丙 蛇空后 勾發酉甲 陰丁卯 戊辰巳 庚午白 巳巳庚午白 辛未空 壬申青 癸酉勾 父才兄 子未寅 甲申丙 蛇空后 勾發酉甲 陰丁卯 戊辰巳 庚午白 巳巳庚午白 辛未空 壬申青 癸酉勾
--	---

原圖4

重製圖4

謹將咸豐元年江西硤江縣曾教職所占六壬課問廣西賊匪何時可平，課名判白，並詳查已宮分野，繕具清單，恭呈憲鑒。

計開

遊都立午，將乘天乙遁旬丁，廣西分野屬巳支上子，此乃月剋煞，其陰子即賊神一家眷屬。兵占云賊在東南，災稍重，其負固不服宜矣。不知主將年命，只論勾陳，今勾陳不制遊都，卻來尅日，雖有官軍，不過虛糜兵餉耳。勾陳臨日，既為支巳剋煞所尅，而其陰即元武與巳相生。竊恐軍營肘腋之間，罔非賊黨藏匿。用起騰蛇，士卒驚駭；天罡指酉，車馬損傷。刻下若與交兵，支上子巳並見，合成死字。賊必有埋伏，詭詐多端，大非官軍之利。所喜遊都雖盛，巳帶破碎，而為遁干乙木所剋。立午宮午丑相害，魯都乃賊之巢穴，子未亦相害。支上巳月內死氣，元武陰神，神將剋戰，是賊黨已離德離心，互相吞噬。明年歲運屬木，歲君遙制其命，三傳初生未，而未剋中寅為日祿，且係戰雄，能剋遊都、元武。大曜乘權之辰，交上巳，即是喝散，當有木命大將揮天戈而掃梟槍者。雖土旺於四季，未能盡數殄滅，而釜底遊魂，亦不足為大患矣。

謹按大六壬大全書內載翼軫楚分野，翼軫在巳，自張十五度至軫九度屬楚分野。

……

咸豐六年八月 日 署潮州運同顧炳章謹呈

(g) FO931/0374

丁巳七月十一日午刻

柳真君曰，元師弟叩

師乎。

兩師尚未回壇也。恭叩

呂帝君飛昇表文，着於十二日戌刻預祝焚化可也。恭賀地官表文，仍着於十四日戌刻預祝焚之。元師弟邇來起居果順適否，前所服之符頗覺應驗否？如覺應驗，不妨多服數十帖也。洋煙之害人也，深矣。子不能遽斷，由漸而戒可也。何妨將靜子之藥方而一試之耶？果能斷了煙癮，大地逍遙，無拘無束，真乃快樂仙也。吾不嫌苦口再三勸子，子其由漸而戒，斷了此癮，吾之心甚快矣。來月十五日加冠約有數子，子居酒派，須備美酒以敬

兩師也。不多贅，止乩。

Journey of Spirit-Writing and Divination: Ye Mingchen's Prophecy Techniques and Political Fortunes

Zheng Xixun

Abstract

The claim that Ye Mingchen 葉名琛 (1807–1859), Governor-General of Liangguang, caused the fall of Guangzhou due to his superstition in divine omens during the Second Opium War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though these examinations have not delved deeply enough.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leave significant room for interpretation. The Ye Mingchen Archives contain seven records of divination and spirit-writing, which, when analyzed individually, reveal they were created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venth years of the Xianfeng 咸豐 reign. Most of these records aimed to predict political developments and guide decision-making, either directly produced by Ye Mingchen or closely linked to him. These records form a foundation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Ye's conduct during the Second Opium War. By reconstructing the context of an anonymous unpublished memorial in the Wu Xu 吳煦 Archives and combining accounts from war eyewitnesses such as Elgin (1811–1863), Hua Tingjie 華廷傑 (1822–1872), and Chen Li 陳澧 (1810–1882), it can be confirmed that Ye repeatedly prayed to deities during the Guangzhou campaign, a practice correlated with the failure to defend the city. Judging from these records, the Ye family was likely a Daoist household deeply engaged in spirit-writing. Ye Mingchen's experiences illustr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ophecy techniques and politics. This not only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al history through a social history lens but also sheds light on the neglected spiritual world of the past.

Keywords: Ye Mingchen, divination, spirit-writing, the Second Opium War, spiritual world